

名称之辩：重思中国百年人类学博物馆实践*

A Century-long Debate: Rethinking Chinese Anthropologists' Museum-Related Practices in China

罗 攀

Luo Pan

(中国民族博物馆, 北京, 100080)

(Chines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Beijing, 100080)

内容提要：一座以中国境内各民族为展示对象的国家民族博物馆应该如何命名？20世纪至今，围绕这一主题大约出现了四次相对集中的讨论。讨论的焦点在于：人类学与民族学者如何通过博物馆，表征中国这样由多民族融合成一体文明国家。这些历时百年，至今悬而未决的名称之辩，折射着中国人类学及民族学界与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参与国家民族关系治理的一段历史。

关键词：人类学 民族博物馆 文明人类学 民族学博物馆

Abstract: What should a museum that showcases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China be called? From the 1920s to the present,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tinued to debate the definition of “museum of ethnology” in China. This unresolved century-long debate reflects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cal museums in China over a period in history when Chinese anthropologists participated in the governance of relations amongst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Key Words: Anthropology; museum of nationalities; anthropology of civilization; museum of ethnology

晚清以后，在内外交困中，中国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疆域和主权意识的现代国家，并催生出了崭新的共同体意识。近代知识分子们认为，通过博物馆对民众开展民族知识与中华一体教育势在必行。于

是，他们选择并吸收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用于研究并展示中国内部族群。

但一座以中国境内各民族为展示对象的国家民族博物馆应该如何命名？20世纪20年代至今，以人

* 本文是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博物馆史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类学与民族学者为核心，围绕这一主题大约出现了四次相对集中的讨论，每一次讨论都或多或少地伴随着中国各界关于“民族”“中华民族”，以及国内民族构成的认识演进。在时断时续的努力中，一种相对统一的认识渐渐浮现：作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悠久、民族关系复杂的文明体，展示中国境内民族构成的博物馆，势必不同于欧美语境中向主体民族展示文化他者的博物馆。这四次讨论是学术界与政治领域对于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是否适用于阐释中国多元一体的内部人口构成与文化形成过程的思考，同时也应被视为人类学中国化不可忽视的一段历程。

对中国博物馆的系统研究相对较为晚近，一些学者如吕烈丹（Tracey L-D Lu）^[1]和徐坚^[2]描述了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注意到了传教士、人类学家开展的收藏实践，吕烈丹特别指出博物馆与展览业作为塑造新中国的文化工具性质。近年来，也有部分海外学者留意到了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如邓滕克（Kirk A. Denton）和马秀雅（Marzia Varutti）分别在其著作中提及少数民族题材的博物馆、展示场所与展览。马秀雅认为民族博物馆“其目的是在最需要执行的地方彰显中国国家的政治权威和宏大叙事”，而民族主题展览被描述为政府以博物馆为媒介的单方面愿景^[3]268、270。邓滕克提到了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存在^[4]，但访谈材料则相对有限。而这些著作将展示中国少数民族的博物馆与相关展览视为政治展演，国家意志占绝对主导。

一、20世纪20—40年代： 博物馆名称初议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发表于1921年2月14日的一篇

名为《何谓文化》的演讲稿中，首次提出“人类学博物院”概念，将之作为与“历史博物馆”互为补充的一种类型。他认为：“历史博物馆，是按照时代，陈列各种遗留的古物，可以考见本族渐进的文化”；而人类学博物院则是“陈列各民族日用器物、衣服、装饰品以及宫室的模型、风俗的照片，可以做文野的比较”^{①[5]}。1926年，在多次出访德国后，蔡元培又发表《说民族学》一文，在中国提倡“民族学”^[6]。该文被认为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探讨自己的民族学问题”^{②[7]}。蔡元培认为较之人类学而言，民族学更注重各民族文化的异同，重视全面与整体，并且更偏于记录。他还特别提出，民族器物与民族学材料可资为考古资料的佐证^[6]。在这一时期，受不同留学背景的学者影响，“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用法几乎是同时并行，一定程度上相互通用，但自此以后，蔡元培开始专门采用“民族学博物馆”一词。1928年，蔡元培利用主持国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工作之机，再次提议建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供外界人士之参观，而为社会教育之一助也”^[8]。他联络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展开了大规模民族文物调查与收藏活动。这些调查行动范围既广博，内容也相当深入，留下了丰富的田野材料与民族文化标本^③。根据何联奎的记载，蔡元培一度提出建立“中华民族博物馆”。但这一名称之下的博物馆仍旧是以“民族学”作为支柱学科的，因为其创设目标是“既可供给民族学研究的资料，又可代表每一个民族文化和发扬民族精神”^[9]。为推动这项工作，蔡元培邀请德国学者但采尔（Teodos Wilherm Danzel）进行策划，并收集了若干中外文物与图片。由于经费限制，这个宏大设想最后仅缩减为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内设置一个民族学陈列室。

① 蔡元培还于同年刊文提出创建包括“人类学博物院”在内的“五院”（即科学博物院、自然历史博物院、历史博物院、人类学博物院、美术博物院），人类学博物院被视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 文中所指的人类学实际指的是美国体系中包含“体质、考古、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四大分科的人类学科学（anthropological science），而蔡元培所推崇的民族学则更近似于文化或社会人类学。

③ 尽管理念不同，但其中的许多关键人物都成为中国后来建设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先行者。如林惠祥自1934年开始以人类学四大学科为框架，开展建设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实践。



蔡元培建设一座国家“民族学博物馆”的努力中，最为接近成功的一次尝试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博物院的筹备工作。1933年，蔡元培推动教育部在南京设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设人文、工艺、自然三部。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建立，与当时抗战大背景下探讨边疆治理及国内人民构成的阐释体系契机密切相关，也是民国时期以留学生为主的学者参照西方博物馆模式、创建中国博物馆的一次伟大的集体尝试。国立中央博物院的设置是跨学科的，与蔡元培早年提出的“五类博物馆”^[5]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处，其自然、历史、人文与工艺结合的目的，是以博物馆形式增加各民族之间多方面的相互认识。其中设立人文馆的宗旨仍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10]2}为核心，希望“使民众得明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递演之迹，并以促进民族之自觉心”^{[10]30}。人文馆收藏范围第一项是历史材料，第二项即为边疆民族物质资料，“以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为主，凡与人类文化演进相关之材料，均陈列之”^{[10]4}。通过收藏形式，将民族标本作为国家级博物馆的一部分，全面重塑了博物馆中的少数民族文物在学术方面的价值，在政治上肯定了民族文物作为博物馆藏品的意义。而通过将中国内部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与民族间文化互动进行整体呈现，更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一体性提供历史与民族志的参照，以适应复合文化多元与国家一统的新型文化塑造的需求。

除蔡元培外，也有学者提出建设展示民族文物的国家博物馆。如人类学者陶云逵于1941年提出建立国立边疆人文博物院，设总院于首都，在兰州、成都、昆明、桂林设四个分馆。陶云逵的建馆与展览的理念，是以增进民族之间了解、呈现各民族互动为目标的，如他所提出的创设博物馆目标是“培养国族意识”“使人民对边疆文化有正确之认识”^[11]。陶云逵的思想代表当时的人类学家加强中华民族一致认同的努力。但随着陶云逵英年早逝，这一计划未能有深入进展。

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外来侵略加剧、边疆与领土危机日益深重的环境中，而当时谋求建设一座国家民族学博物馆的实践表明，从海外学习

人类学民族学归国的学者们将学科建制、民族文物收藏与国家民族治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以辅助表征当时关于“国家包含无数民族”的思路。毕竟，从文化同源角度思考一体，在一统的格局上承认多元，是当时整个学术界达成的一致认识^[12]。

二、20世纪50年代：“民族博物馆” 概念的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重新动议建设一座国家级博物馆来展示境内的少数民族群体，由此而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博物馆命名的讨论。1950年以后，“建设一座国家级博物馆展示少数民族”的动议是由几个方面的机缘促成的。首先，中央人民政府曾频繁组织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进行探访，也多次组织民族代表进京参观，由此积累了大量来自民族地区的民族文物^[13]。其次，1950年前后的多次田野调研收集了一定数量的民族标本和资料，在以人类学家吴泽霖为代表的学者们倡议下，全国各地多次举办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博物馆的文物与资料储备都已经相对成熟。第三，在各地设立民族博物馆也是推广民族政策的重要方式。1950年6月至8月，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始考虑着手建设一座博物馆，进行常规性的收藏、展览工作，并迅速正式组建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由吴泽霖担任主任。同年，文化部、文物局召开专题座谈会讨论“兄弟民族文物搜集范围”；8月19日，曾昭燏受委托草拟了《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对于国内各兄弟民族的收集范围》（以下简称《范围》），建议“悉以各兄弟民族特有为主，着重搜集表现特别发明或有艺术价值的东西，注意表现兄弟民族的生活、才能与知识。”^[14]《范围》虽颇为简略，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博物馆的定位与后续展陈的需要，增加了反映阶级性、民族英雄与革命斗争历史的收藏内容。《范围》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20世纪40年代学者们在传播论影响下按照文化区进行征集的方式。这种方式认可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并延续了对中华文化一体性的思考。



建设民族博物馆的讨论刚刚拉开序幕，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即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调整。在1952年这场被杨圣敏称之为“脱胎换骨”的调整中^[15]，高校中人类学专业作为资产阶级学科宣告停办，而民族学则因为是苏联模式的学科体系内容之一而得以保存在历史学中。1955年，周恩来总理到昆明参观云南民族文物展，参观后对民族文物工作做出指示：“要进行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要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要用考古材料印证文献记载，要用实物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周恩来总理还对人类学家杨堃提及：国外的民族学博物馆反映的尽是殖民地附属国一些民族的落后面。而我们要宣传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对本民族和对其周围民族的影响，宣传各民族对缔造伟大祖国的贡献^[16]。

1956年2月，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费孝通针对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提出：“我们绝不能遵循资本主义的套路，把自己的文化当作民俗学，把其他民族当作民族学来研究。因此，我反对把收集、研究和展示汉人生活的博物馆称为‘民俗博物馆’，把展示民族的博物馆称为‘民族学博物馆’。我认为这两种类型应该统称为民族博物馆。”^[17]同年4月，由于《论十大关系》一文的发表，民族交流被提升到较高的政策位置。费孝通、林耀华《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中提出民族学的工作中心应根据实践的需求而有所转变，侧重于社会性质、文化和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观察与研究思路表现出苏联民族学的鲜明影响，如重视“生产工具”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关系，而不是在区域内的传播；文内特别指出，这些工作均属于我国少数民族研究范围，但“并不应当引起这样的误会，以为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来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18]

费孝通建议以“民族博物馆”为名称，旨在创建一种不同于人类学或民族学博物馆的新型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的工作方法或许是民族学的，但其收藏与展示范围则同时涵盖汉族与少数民族。同年，杨成志、吴文藻、潘光旦等人一同起草了《中

国民族博物馆十二年远景规划》。“民族博物馆”这个新概念取代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以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一体，并突出中国民族学与西方体系的不同，“建设一座与民族学博物馆不同”的国家民族博物馆成为学界与政治领域的一致认识。其后，周恩来提出将“民族博物馆”作为十大博物馆之一，被列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建筑。但最终，博物馆被整合进了预备在1959年作为国庆献礼建筑的民族文化宫内，关于名称的讨论也暂时告一段落。

三、20世纪80年代：走向“综合性”的“民族博物馆”

20世纪80年代初，高校民族学与人类学专业渐次复兴。同时，另行建设一座国家民族博物馆以展示与保存民族文化的倡议也开始出现。重新建设国家民族博物馆的呼吁，主要出自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198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草案）中，也强调了民族文物保护。其次是当时民族文物存在“缺乏经常不断的调查征集，保管与研究不善，消失、流散、损坏严重”等问题，使各民族地区建立博物馆保护文物成为必要。此外，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复兴为建设民族博物馆提供了学术支持。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于1980年10月20至26日在贵阳召开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233位人类学家、民族文化工作者作为代表参与此次会议。会上讨论民族学发展规划时，多位学者将建设博物馆视为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21]}，他们提出应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并满怀信心地认为新的体系可以成为民族博物馆的学术支撑。

自1980年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以后，不断有人撰文再度就博物馆名称进行辨析。大体上，学者关于博物馆名称的意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大部分学者不刻意区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两个名称，而是认为民族学是民族博物馆的当然支柱。如梁钊韬将中国式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的方式做了梳理，提出在吸收“传播论”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有的民族学体系，在

中央建立“民族博物馆”；认为“民族博物馆”既是学科建设的一部分，又具备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宣传民族政策的功能^[20]。林耀华于1981年重提民族学博物馆（或民族博物馆）定义，将其作用视为“除了陈列、研究、保藏文物和标本以外，还有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介绍我们的民族研究工作的成果、促进各民族团结等重要作用”^[22]。杨堃同时使用“民族学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两个名称，将前者作为方法，而将后者作为博物馆名称，并得到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认可。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学博物馆本身应担负起宣传国家民族政策的内容。如陈克进直接提出，民族博物馆应该直接更名为民族学博物馆，因为“民族博物馆从实物收集、鉴定、研究、陈列到发挥其社会功用，离不开民族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科研成果”^[23]。王昭武提出：“在首都设立综合性民族学博物馆，这种综合性博物馆应该面向全国各民族……完整地再现中国各民族（包括汉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24]但也有学者开始审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理念差异。如1985年吴泽霖提出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都是社会类专业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服务于研究，而民族博物馆则服务于政治宣传，是“有关少数民族的一种专业性博物馆”^[25]。吴泽霖的观点说明民族博物馆的政治功能被强化，因此学科需求也更偏综合。这些讨论表明，学者们将博物馆建设包含在学科规划之内，从名称的辨析、文物收集的方式方法和理论支撑上，为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建立提供帮助，并同时灵活运用着“政治”与“专业”两套话术。

1983年2月，胡乔木提出，博物馆事业需要逐步有一个大的发展，并特别提到当下“没有民族博物馆”^[26]。同年3月，国家民委邀请统战部、文化部，召集专家学者集体讨论后，向国务院提请建立一座国家级民族博物馆。1984年，民族博物馆筹备组负责筹办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27]，会议上宣布“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组”正式成立，并将“再现各民族历史”“反映各民族在解放后的大飞跃”“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尊心”等“不

可估量的意义”赋予了筹备中的博物馆。由于民族文物急剧流失，也由于中国民族博物馆尚未获得建设正式馆舍的批复，1985年开始，工作重心完全偏重于收集文物与申请建设馆舍。因此对于第三代“民族博物馆”的实践者们^[28]，掌握收藏民族文物的科学方法更为重要。1985年11月，民族博物馆工作人员奔赴海南进行黎族文物征集，费孝通特意在广州为他们进行收集与调研培训^[28]。随后筹备组迅速铺开了征集、收藏、展示、研究等工作。筹建计划获得了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机构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广泛关注，甚至引起了世界各国人类学界的注意。1987年，在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工作专家座谈会上，人类学家吴泽霖、杨成志、杨堃，历史学家白寿彝，考古学家苏秉琦与筹备组组长马寅讨论了博物馆的工作方法，提出博物馆应该综合采用历史、考古和人类学方法，成为一种多学科的综合体，并将“民族博物馆”这一名称暂时固定了下来^[29]。

四、21世纪：民族博物馆的学科规范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之前，中国民族博物馆日常工作以民族文物收藏和争取中央批准建设实体馆舍为主。21世纪，基于1980年以来的民族文物保护工作发展，以及中国民族博物馆近30年实践的思考，学者们对民族博物馆名称有了新的认识。人类学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文明研究”等概念与方法日渐成为中国民族博物馆规划其发展方向的理论依据，并在新时期再一次引发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名称讨论。

1988年，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将中华民族定义为：“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元，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30]他还注意融合了历史学的视角，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过程性的，经历了从



“自在”到“自觉”的漫长历史，“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0]3-4}

自20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其影响力迅速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界扩展到社会范围，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人类学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的概念。中国民族博物馆要从大历史框架下，通过展览解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走向一体的过程；同时要从文化方面分析民族的融合与交流。但大部分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更没有历史文献作为叙事的依据，难以完全凭借历史与考古依据展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而人类学长期关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族群文化互动，可以和历史与考古资料互为补充，也更具有对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历程的解释力。这实际上也回归了百年前蔡元培倡议民族学博物馆的初衷：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断片的部分事实提供民族学与民族文物的佐证。

21世纪以后，文明研究的影响开始初现端倪。文明人类学的西方血脉可追溯至莫斯（Marcel Mauss）等人将“文明”视为一种“事实基础”（factual grounds）的论述。在中国人类学脉络中，体现为自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之后提出“美美与共”的文明共处法则^[31]，以及王铭铭的“超社会体系”概念等^[32]。

21世纪，关于民族博物馆名称与支柱学科的讨论再度开启。2006年，石建中将民族博物馆定义为“国内少数民族的专业性博物馆，或反映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的一种博物馆……分为四个类型：一、中央的综合性民族博物馆；二、地方性民族博物馆；三、民族学博物馆；四、专题性博物馆”^[33]。该分类方式是对上一个历史阶段的总结，将国家级民族博物馆视为“综合性”，而“民族学博物馆”则是与之相关的专业型博物馆。但同一年，苏东海提出“应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博物馆”，更鲜明地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

史……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他认为中国的民族博物馆应该建立在中国的文化与现实基础上，并且拥有自己的学科体系^[34]。2010年潘守永提出：我国语境上的民族博物馆实际上就是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只是“人类学的缺席，使得民族博物馆游离于应有的规范之外，自身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地位”^[35]。2014年，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郑茜提出，民族博物馆需要寻找学理的合法性，并且认为将博物馆的英文名称明确翻译为“民族学”博物馆，是表达与世界人类学接轨的愿望^[36]。陈志明也在2016年指出，民族学博物馆是与人类学有直接关系的博物馆，而中国民族博物馆本应是中国最大的民族学博物馆^[37]。

21世纪的中国民族博物馆在以历史和考古为中心的博物馆体系中，面对收藏、展示等实践中的现实开始重新寻找人类学的学理支持。2011年中国民族博物馆呈报《项目建议书》时，展览目标已经明确为“以历史实物支撑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史”^[38]。2020年的《项目建议书》则提出“以物证方式呈现多元一体的中国”^[39]。《项目建议书》除了保留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保护民族文物、呈现丰富中华文化的功能，并增加了通过展览表述中华民族长期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共同性的功能。人类学的观念已经在许多中国当前的艺术与文化展览中受到了重视。在中国的民族博物馆中引入人类学视角，更应该有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人类学除了为展览国家一体性提供视角，还可以被运用在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各类文化展览中，为之增加诠释性。

五、余论

本文描述的关于民族博物馆名称的百年争议，其中的深层背景，是学术界与政治领域对于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是否适用于阐释中国多元一体的内部人口构成与文化形成过程的思考。

蔡元培等人之所以劳心劳力筹谋一座国家级民族博物馆，一则是在当时作为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辅助，适应复合文化多元与国家一统的

新型文化塑造的需求；二则也为呼应当时学界关于“国家包含无数民族”的思路，以人类学民族学专业为根基，以教育民众为责任。随后中国人类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在“文化多元”与“国家一统”两方面迅速达成一致，但同时也在调研中发现西方关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体系。他们满怀强烈的责任感，开始强

调中国内部构成的发展路径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不同，并试图用博物馆展示来阐释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与文化方面的一致性。

这场百年争议的背后是中国的人类学者推动建设中国人类学体系的持续努力，而最终诞生的“民族博物馆”这一特殊名称，是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体系与博物馆的政治功能结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 [1] LU T L-D. Museums in China: Power, Politics and Identities[M]. London: Routledge, 2014.
- [2] 徐坚. 走出收藏史，走向思想史[J]. 中国博物馆, 2015 (4): 1-13.
- [3] VARUTTI M. Museums in China: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fter Mao[M].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4.
- [4] DENTON K A. 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215.
- [5] 蔡元培. 何谓文化[M]//蔡元培全集(第四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0-14.
- [6] 蔡元培. 说民族学[M]//蔡元培全集(第五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03-108.
- [7] 顾定国. 中国人类学逸史: 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M]. 胡鸿保, 周燕, 译.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0: 39.
- [8]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R]//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 南京: 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 1929.
- [9] 何联奎. 蔡子民先生对于民族学之贡献(代序)[M]//蔡元培民族学论著. 台北: 台湾中华书局, 1962: 18.
- [10]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Z]. 南京: 国立中央博物院, 1942.
- [11] 陶云逵. 国立边疆人文博物院计划书[A]//南开大学博物馆藏精品图录. 西南联大时期民族调查文书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206.
- [12] 刘波儿.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 民国时期民族学界“多元”“一体”理论设计研究[J]. 民族研究, 2018(3): 56-63.
- [13] 马寅. 加强对民族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在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8(1): 12-16.
- [14] 曾昭燏. 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对于国内各兄弟民族文物的搜集范围[M]. 曾昭燏文集·博物馆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62.
- [15] 杨圣敏. 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J]. 西北民族研究, 2009(2): 14-38.
- [16] 杨堃. 回忆周总理关于民族学的一次谈话[J]. 社会科学战线, 1978(4): 224-227.
- [17] 费孝通. 关于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意见[M]//费孝通民族研究论文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8: 109.
- [18] 费孝通, 林耀华. 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J]. 科学通报, 1956(8): 1-17.
- [19] 陈国强. 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M]//民族学研究: 第一辑: 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0: 80-86.
- [20] 梁钊韬. 我国应有自己的民族学[M]//民族学研究: 第一辑: 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0: 12-22.
- [21] 金天明, 杨庆镇. 当前我国民族学的特点和任务[M]//民族学研究: 第一辑: 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0: 67-79.
- [22] 林耀华. 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展望[J]. 民族研究, 1981(2): 48-55.
- [23] 陈克进. 从“民族博物馆”名称说开去[M]//吴文藻纪念文集.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 109.
- [24] 王昭武. 谈民族学博物馆[M]//民族学研究: 第三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2(1): 283-287.
- [25] 吴泽霖. 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3): 73-82.
- [26] 胡乔木. 博物馆事业需要逐步有一个大的发展[J]. 博物馆, 1984(1): 5-7.



- [27] 伍精华. 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工作会议开幕词[Z]. 1984-10-27.
- [28] 费孝通. 1985年11月1日在广州接见中国民族博物馆海南工作队全体队员时的讲话[J]. 民族文物工作通讯, 1986(2): 1-2.
- [29] 1987年国家民委召开关于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工作的专家座谈会会议纪要[A].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藏资料.
- [30]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 [31] 费孝通. 缺席的对话: 人的研究在中国: 个人的经历[J]. 读书, 1990(10): 3-11.
- [32] 王铭铭. 超社会体系: 文明与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33] 石建中. 民族博物馆学教程[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45-46.
- [34] 苏东海. 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几个基本问题(提纲)[M]//博物馆的沉思: 苏东海论文(卷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18.
- [35] 潘守永. 民族博物馆是什么[N]. 中国民族报, 2011-10-29.
- [36] 郑茜. 民族博物馆? 民族学博物馆?: 对一种独特的中国博物馆现象的理解与阐释[M]//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 2014: 上.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4: 2-19.
- [37] 陈志明. 博物馆、文化遗产与华侨华人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 2016(2): 39-48.
- [38] 中国民族博物馆立项建议书[R]. 2011.
- [39] 中国民族博物馆立项建议书[R]. 2020.

征 订 启 事

《博物院》杂志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主办和出版, 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院共同协办的国家级博物馆行业学术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专题探索、理论研究、博物馆实践, 涵盖与博物馆相关的以下学术研究成果: 博物馆学理论与博物馆史, 藏品征集与保管, 藏品修复与保护, 藏品研究, 展览与展评, 博物馆教育、宣传与文创, 博物馆管理、开放与安保, 博物馆建筑, 博物馆数字化与信息化, 与博物馆相关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与研究等。

2024年定价: 58元/期; 全年刊期: 6期; 全年定价: 348元。国际标准大16开本, 136面, 全彩印刷, 面向国内外发行。

订阅方式:

1. 邮局订阅, 邮发代码 80-603。
2. 科学出版社期刊发行部, 联系电话: 010-64017032, 010-64017539。
3. 淘宝店铺、微店店铺名称: 中科期刊(订阅或购买过刊均可)。
4. 扫描下方二维码:



5. 直接办理银行汇款, 指定汇款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首体支行

银行账号: 0113014170012168